本期專題

「知識組織研究在地化」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圖書資訊學刊　第13卷第2期　（2015.12）　頁99-105
doi:10.6182/jlis.2015.13(2).099

原住民族、孔子及知識組織

專題編者序

Indigenous Peoples, Cofucius,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Guest Editoral

李鶴立[1]

Hur-Li Lee[1]

「知識組織」（knowledge organization）是一個相對來說十分年輕的學術領域。國際知識組織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簡稱ISKO）正式成立於1989年，知識組織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實不超過30年。這個領域的歷史雖短，它的重要性卻不可忽視，在圖書資訊學界，知識組織的理論與原則尤為舉足輕重，是許多資訊系統的基石。

和多數的現代學術領域一樣，知識組織始於歐美。據我的觀察，它在臺灣似乎還沒有立足（或者該說，它的發展還不夠全面），和我接觸的臺灣學生也對知識組織頗為陌生。為了推廣知識組織，吸引更多學者、學生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與發展，我在2014年得到《圖書資訊學刊》的主編黃慕萱教授的支持，開始籌畫這一期專題「知識組織研究在地化」。在本文中，我將先介紹知識組織的領域，接著敘述專題的主旨，然後簡短討論收錄的每一篇論文。文末，我對這個領域在臺灣的未來發展提出一些期許。

任何一個領域、一個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有不同的名稱。一般公認，知識組織一詞源自美國分類學家Bliss的著作*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ystem of the Sciences*（1929）和*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Libraries and the Subject-Approach to Books*（1933）。20世紀末以來，資訊組織（information organization）也是一個常用的名詞，如Svenonius（2000）的經典作品*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就使用資訊組織一詞。我所任教的學校曾設資訊組織研究羣（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Research Group），現已改稱知識組織研究羣（Knowledge Organization Research

[1]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Wisconsin, USA
E-mail: hurli@uwm.ed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roup）。丹麥學者Hjørland（2012）曾討論過資訊組織及知識組織之間的問題，讀者可以參考他的論述。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二者在文獻中也常有差異，譬如有知識組織學者將圖書館編目等資訊組織議題排除在知識組織之外，也有資訊組織研究者或實務從業者不認同知識組織領域。臺灣的學界大多採納資訊組織一詞，研究的範圍似乎多圍繞在系統及工具，甚少議及知識的內容或特性。我個人傾向於採納廣泛的定義，認為這個領域應有一個寬廣的範疇，兼容所有在兩個詞彙中所包含的觀念。同時，我主張採用知識組織一詞為領域的正式名稱。

我對知識組織一詞的偏好是有原因的。近年來，我以西漢劉歆的《七略》為研究中心，尤其對《七略》的知識結構特別感興趣，曾經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它的分類體系（Lee, 2012）。當我們一般提及知識，通常會聯想到觀念（concept）、詞彙（terminology）、意義（meaning）、關係（relationship）、順序（order）、結構（structure）、方式（approach）、角度（perspective）和脈絡情境（context），這些正是知識組織領域中的核心議題（Smiraglia, 2014b），也是我最常思考的主題。相對來說，因受到資訊科學的影響，資訊一詞並不一定讓我們聯想到其中幾項（譬如：意義、方式、角度或脈絡情境）。所以，我主張用知識組織一詞。

學科的建立從不是憑空而來。雖然知識組織的成立只有二、三十年，它所研究的工具、方法和原則卻多有悠久的歷史。德國學者Ingetraut Dahlberg在1989年建立ISKO之前，先於1973年創辦了*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期刊，這期刊於ISKO成立時，成為ISKO的出版品，並於1993年改名為*Knowledge Organization*。我們可以從期刊的原名推知，Dahlberg最早的關注重心是分類法。分類法的設計與研究源自上古，直至今天，仍是知識組織的一個焦點（請參考Smiraglia, 2014a）。知識組織自始就和圖書資訊學有密切的關係，它所涉及的組織工具有多數來自傳統圖書資訊界，譬如：圖書分類法（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索引典（thesaurus）、主題詞表（subject headings list）及書目（bibliography）（包括圖書館目錄 library catalog）等。隨著科技發展，新的知識組織工具也陸續出現，像是：後設資料（metadata）、語意網（Semantic Web）、知識本體（ontology）（註1）。

既然「知識」是知識組織的基本元素，知識組織與其他研究知識的學科都有或多或少的關聯性，這些學科對知識的研究與詮釋可以增加知識組織的多樣性，強化它的理論性。舉例來說，在西方哲學傳統中，知識的研究有兩大課題：一、甚麼是知識？二、知識是如何產生、獲得的？前者屬於本體論（ontology）（註2），後者則是在認識論（epistemology）的範疇內，這些哲學論述都可作為知識組織的理論基礎（Smiraglia, 2014b）。我所屬的知識組織研究羣在過去三年間出版了兩本論文集，第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以知識論的角度討論知識組織（Smiraglia & Lee, 2012），第二本則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探索 （Smiraglia & Lee, 2015）。當我們將知識作為組織的對象，就會考慮到知識的本質、語言對知識的影響、知識的傳播、知識的歷史發展、各種知識觀、知識與社會文化間的關係等。這些思考的方向自然引導我們去參考其他相關的學科，這些學科包括：認知學（cognitive science）、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認知人類學（cognitive anthropology）。換句話說，知識組織是個多學科的混合體。

知識組織領域因起源于歐美，它的主流研究也以歐美的實務、理論和系統為中心，並立基于傳統西方的知識觀與知識體系。這樣的知識觀強調知識的共通性（universality），所以對組織系統要求客觀、統一與標準。近年來，持另一種看法的學者逐漸增多，也逐漸有取代主流的趨勢，他們重視知識的多元性（diversity），認為每個社羣創作的知識反映這個社羣的特殊文化與社會現象（如：Beghtol, 1998; Mai, 1999）。有一些研究揭露所謂「共通性」的謬誤，指出這樣的共通性實際上只限於某個社羣、某個文化的範圍，並不見得適用於其他社羣或文化（如：Olson, 1999）。所以，持後一種看法的學者建議在系統設計時應極力配合個別社羣的特定需求（Hjørland, 1997），為個別社羣建立的知識組織系統也如雨後春筍，多不可數。這類知識組織系統中，有些是為了一個單獨的領域或特定的資料庫所設，像是臺灣農業科學資料服務中心所編的《農業科技索引典》及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的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有些系統是為一個特殊用途而設，像是全球資訊網聯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or W3C）的*The Organization Ontology*；還有許多系統是為私人企業或個別組織所設。

雖然在過去大多數的知識組織研究文獻中，以個別社會、文化的需求為重心的考量常被忽略，或僅僅是一筆帶過，但是我們仍舊能從少數的經典作品中找到這一類的論述。以Bliss（1929）為例，他認為知識組織反映一個社羣或機構的關注焦點和追求目標，也必須配合此社羣或機構的功能、活動和業務。Egan與Shera（1952）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強調書目學（與知識組織有大幅交集）與社會的關係及其社會功能。Shera在1967年到印度講學，更特別提及文化差異、歷史變遷對知識及知識組織的影響（Shera, 1970）。自20世紀末以來，更有少數知識組織學者致力研究文化對知識體系的影響，並呼籲大家走出西方傳統的侷限（Neelameghan & Raghavan, 2012; Olson, 1999）。更重要的是在組織系統、工具發展多元化方面，世界某些地區已有可觀的成果，像是澳洲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峽島民研究中心（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所編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Pathways*及美國的*Mashantucket Pequot Thesaurus of American Indian Terminology*。這些工具的開發都來自對一般常用系統（譬如：美國*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的不滿，因為主流系統往往忽視少數族裔關注的議題，或採用鄙夷少數族裔的詞彙及與其文化格格不入的觀念結構，這些缺點不僅有辱他人，更給關心非主流文化議題的使用者帶來困擾，是資訊搜尋的一大障礙。今年夏天，美國的*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期刊以「原住民族知識組織」（Indigenous Knowledge Organization）為題，出了一期專題，顯示這類的思考已得到廣泛注意（Doyle & Metoyer, 2015）。

對我個人而言，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原理固然不可或缺，但是為自己的社會文化作深度的思考、反省更是有趣；世界統一通用的資訊系統固然有用，但是如果一味使用他人系統而罔顧自己的文化特色與社會需求，小則會影響資訊服務的品質，大則會造成自己文化的流失。在籌備專題的過程中，我偶然得知即便是20世紀初現代化剛起步的中國，也有學者倡議建立現代圖書系統，在模仿西方作法的同時，也必須考慮中國文化學術的特殊需求。譬如說，梁啟超（1873-1929）在1926年的《圖書館學季刊》發刊辭中說：「圖書館學之原理原則，雖各國所從同，然中國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學術發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書籍之種類及編輯方法，皆不能悉與他國從同，如何而能應用公共之原則，斟酌損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國圖書館學』之系統，使全體圖書館學之價值緣而增重（梁啟超，1926）。」言猶在耳，值得我們再度思考。本期專題的主題定為「知識組織研究在地化」，就是想給知識組織打一劑文化的強心針。專題的徵稿啟事在提及知識組織及知識組織系統的研究之外，特別邀請研究人員融入下列議題：

- 地區特色
- 語言文字
- 特定社會群體（尤其是臺灣的社會群體）
- 文化特質（尤其是臺灣各族群的文化特質）
- 認知方式

這期專題的目標是作為一個催化劑，希望能帶動大家一起多關注自己的知識源流、發展及特色，並以這作為研究基礎，來建立以自己文化為中心的知識組織理論及系統。

本刊的頭兩篇論文從原住民族的知識出發，十分恰當地凸顯了專題的主旨。第一篇以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原住民族圖書館—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Xwi7xwa Library—的知識組織為個案，深入介紹其系統的發展過程。作者Doyle、Lawson與Dupont描繪了包括加拿大第一民族教育的時空背景，及闡述以這一個以地域為基礎的分析作為指導知識組織在地化的理論框架。雖然這不是一個實證研究，但以扎實的理論架構配合圖書館實務經驗，是難得的他山之石。值得一提的是，此篇說故事的手法正是北美洲原住民族創造、分享知識（也就是研究）的主要方法（Metoyer & Littletre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5）。本刊第二篇論文涉及臺灣本土的原住民族知識，不讓加拿大的學者專美於前。此篇作者盧谷砡樂和吳美美採質性方法，對臺灣原住民族相關的出版文獻進行分析，以期了解此類文獻的趨勢、特性及類別分布。它屬於領域分析（domain analysis）的一種，是知識組織中文獻保證（literary warrant）的根本（Smiraglia, 2012），也是建立一個知識組織系統的必要前奏。這是個好的開端，為臺灣圖資界開闢一條重要的新路。

第三篇論文作者陳淑君和陳雪華檢視兩個中、英控制詞彙（controlled vocabulary）間的相關詞彙對應。詞彙和語意結構是每個控制詞彙最基本的成分，兩者都與語言、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因而控制詞彙的研究往往觸及語言與文化等問題。這篇論文以中國藝術領域為範疇，所選的中文控制詞彙是臺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制定的控制詞彙，英文的則是美國蓋堤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的《藝術與建築索引典》（*Art & Architecture Thesaurus*）。前者專為中國藝術領域制作，後者則涵蓋所有藝術及建築領域，但其基本的觀點則奠基于西方文化。正如兩位作者所說，藝術人文方面的詞彙及語意結構高度反映個別文化，所以中國藝術領域中必定有其特殊詞彙，而所比較的兩個不同語言的控制詞彙必然有明顯歧異。除了檢視兩組詞彙間的對應程度，作者進一步分析二者不能等同對應時的其它對應關係，在結論中更嘗試建議一些提高跨詞彙互通性的實際方法。這個研究揭示了知識組織系統在地化的重要，國際性的控制詞彙如《藝術與建築索引典》無疑地在中國藝術領域內的索引專指度（specificity）不夠，嚴重影響檢索結果的品質。這是一個極為有意義的研究方向。再者，控制詞彙是知識組織的常用工具，它在先端資訊環境中的重要性不減反增，而這一類的研究對促進跨資源的搜尋尤有重大的影響。

本刊最後兩篇論文可以一起參考，也可以做為一個有趣的對照，兩者都環繞著「作者」的概念，研究的對象也都是同一人——在中華文化中有特殊地位的孔子（前551-前479）。受到歐洲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像是Roland Barthes和Michel Foucault的啟發，有數位知識組織研究者（包括編者在內）在近年曾對作者的概念進行深入探討（如：Martínez-Ávila, Smiraglia, Lee, & Fox, 2015），在臺灣的資訊學界似乎這是第一次有論文涉及作者的概念。到底甚麼是作者呢？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作者在知識生產、傳播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呢？每一個文化又是如何塑造個別作者的形象呢？孔子曾經說自己「述而不作」，這句話在今天該如何詮釋呢？述者和作者有甚麼不同呢？知識組織系統該如何處理作者和述者呢？雖然這兩篇論文出發點雷同，卻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一篇作者劉瑄儀以《論語》為研究文本，檢視內文每一章的話語形式及發言主體（the person who is speaking），企圖給「孔子是否是《論語》作者」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第二篇作者劉杰則以《史記・孔子世家》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文本，檢視內文中所記述孔子與不同作品之間的關係。因他主要分析司馬遷描述孔子與作品關係的用詞，此研究實是探討司馬遷如何塑造孔子這個作者的形象。這兩篇論文無疑能加強未來知識組織系統的理論基礎，而這一基礎建立在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上。類似的研究幫助我們為知識組織系統中的作者重新定義，跳脫出機械式的作者認定，而增加社會、歷史、文化的面向。

依據歷史記載，我們創立、發展知識組織系統，迄今已逾兩千年。這些系統種類繁多，包括書目、類書、字書（中文本身就是一個分類體系）、曆書，即使是易經的64卦及文學中的體裁（genre）都是知識組織的系統。對知識組織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個永遠挖掘不盡的寶藏。過去，書目被視為思想史的一種體現，但其實所有的知識組織系統都反映了一個社會各時代、各階層、各行業的思想及知識流變，並不只限於書目才有此功能。如果我們認為文化傳統中的精髓值得保存與延續，就有必要研究古代種種知識組織系統，深入瞭解各種知識觀及知識產物。另一方面，當今的世界雖然已全球化，每一個社會、地區仍然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需求；即便是科技領域也常有地區性。如果二者兼併，當我們承續傳統文化，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同時吸收外來的科技文化，發展適合自己的新知識，我們必然會對知識組織系統有某些獨特的要求。這正是我們推出這一期專題「知識組織研究在地化」的出發點。

註釋

註 1：在此，ontology指的是一種知識組織系統。

註 2：在此，ontology指的是哲學領域中的一個分支。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梁啟超（1926）。發刊辭。*圖書館學季刊，1*(1)，1-2。【Liang, Qi-Chao (1926). [Fa kan ci].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1), 1-2. (in Chinese)】

Beghtol, C. (1998). Knowledge domains: Multidisciplinarity and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 system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25*(1/2), 1-12.

Bliss, H. E. (1929).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system of the sciences*. New York, NY: Henry Holt.

Bliss, H. E. (1933).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libraries and the subject-approach to books*. New York, NY: H.W. Wilson.

Doyle, A. M., & Metoyer, C. A. (Eds.). (2015). Indigenou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pecial issue].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53*(5/6).

Egan, M., & Shera, J. H. (1952).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 *Library Quarterly, 22*(2), 125-137. doi: 10.1086/617874

Hjørland, B. (1997).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subject representation: An activity-theoretical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scienc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jørland, B. (2012).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In A. Neelameghan & K. S. Raghavan (Eds.), *Categories, contexts and relations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ISKO Conference* (pp. 8-14). Würzburg, Germany: Ergon.

Lee, H.-L. (2012). Epistemic foundation of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 in Early China: A *ru* classic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8*(3), 378-401. doi: 10.1108/00220411211225593

Mai, J.-E. (1999). A postmodern theory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 L. Woods (Ed.), *Knowledge: Creation, organization and use: Proceedings of the 62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pp. 547-556). Medford, NJ: Information Today.

Martínez-Ávila, D., Smiraglia, R. P., Lee, H.-L., & Fox, M. (2015). What is an author now? Discourse analysis applied to the idea of an author.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1*(5), 1094-1114. doi: 10.1108/JD-05-2014-0068

Metoyer, C. A., & Littletree, S. (2015). Knowledge organization from an indigenous perspective: The Mashantucket Pequot Thesaurus of American Indian Terminology project.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53*(5/6), 640-657. doi: 10.1080/01639374.2015.1010113

Neelameghan, A., & Raghavan, K. S. (2012). Frames of knowledge: A perspective of Vedic-Hinduism and Dravidian culture. In R. P. Smiraglia & H.-L. Lee (Eds.), *Cultural frames of knowledge* (pp. 19-61). Würzburg, Germany: Ergon.

Olson, H. A. (1999). Cultural discourses of classification: Indigenous alternatives to the tradition of Artistotle, Durkheim and Foucault. In H. Albrechtsen & J.-E. Ma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SIS SIG/CR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Workshop* (pp. 107-124). Silver Spring, MD: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Shera, J. H. (1970). *Library and knowledg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 London, England: Asia Publishing.

Smiraglia, R. P. (2012). Epistemology of domain analysis. In R. P. Smiraglia & H.-L. Lee (Eds.), *Cultural frames of knowledge* (pp. 111-124). Würzburg, Germany: Ergon.

Smiraglia, R. P. (2014a). ISKO 13's bookshel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the science, thrives – An editorial. *Knowledge Organization, 41*(5), 343-356.

Smiraglia, R. P. (2014b). *The element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New York, NY: Springer.

Smiraglia, R. P., & Lee, H.-L. (Eds.). (2012). *Cultural frames of knowledge*. Würzburg, Germany: Ergon.

Smiraglia, R. P., & Lee, H.-L. (Eds.). (2015). *Ontology for knowledge organization*. Würzburg, Germany: Ergon.

Svenonius, E. (2000).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